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主编摇王东京

中国经济观察

悦景慕耕和蝶蝶是碧杂想赠

●摇 圆用缘年卷第 圆辑 摇●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北摇京 ·

责任编辑摇司摇边

封面设计摇孙超英

版式设计摇李摇灵

责任校对摇王洪霞

责任印制摇宋二顺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经济观察 2005 年卷第 1 辑 韩东主编 鄧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

ISBN 7-309-05111-1

Ⅰ 援中...Ⅱ 援王...Ⅲ 援经济-研究-中国

Ⅳ 援云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00000 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电话：(010) 82562000 (办公室) 摇 (010) 82562001 (发行部)

邮编：100081 摇网址：http://www.ccps.cn

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厂印刷 装订厂装订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15

字数：15 千字 印数：1—5000 册

定价：15.00 元

《中国经济观察》

顾问摇摇问摇(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瑶珏摇王则柯摇江小娟摇刘摇伟
刘海藩摇李兴山摇张卓元摇张尧学
苏摇星摇宋摇涛摇顾海良摇梁小民

主摇摇摇编:王东京

副 主 编:赵振华(常务)摇韩保江

编摇摇摇委摇(按姓氏笔画排列):

万安培摇王天义摇王东京摇王国平
王摇健摇宁向东摇张摇军摇张维迎
陈甬军摇陈晓红摇杨秋宝摇杨瑞龙
柳摇欣摇郑公甫摇赵振华摇洪银兴
顾海兵摇黄少安摇梁摇朋摇韩保江
谢鲁江摇潘云良

学术委员会摇(按姓氏笔画排列):

于永臻摇王君超摇石摇霞摇田应奎
刘振英摇刘艳梅摇李继文摇李省龙
李旭章摇李摇鹏摇张玉杰摇张燕喜
陈文通摇陈宇学摇施摇虹摇胡希宁
徐平华摇徐祥临摇贾华强摇曹摇立
曹摇新摇董艳玲

编辑部主任:孙小兰

主 办: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

本 辑 协 办:北京丰中房地产开发公司

目摇摇录

摇摇

勻燥坊費燥澤蚤土云燥藺澤

薛兆丰

摇摇栽藻云鵲鵲栽藻塢燥枣悦藻墜澤鋸糴糴

By XUE Zhaofeng

巩固胜利

摇摇栽耨再耨 顺耕是藻想悦桑泽云耕耨固藻耨

By GONG Shengli

摇摇

礞石滚痰丸 礞石消痰散 礞石除痰散 礞石化痰散

王东京

摇摇栽则豳耘去荒落燥冬怨燥熬螺旱晒磙难蛋甜用缘

By WANG Dongjing

张道航

员

By ZHANG Daohang

By ZHANG Derong

By NING Xiangdong 摇 WANG Hong

By GU Haibing

By WAN Anpei

By GUO Qiren

By CHEN Xiaohong

中国经济观察

第 10 卷 第 1 辑

热点聚焦

Hot Spots in Focus

中国教育的未来走向

薛兆丰

摇摇中国重视教育，历有传统。但如何办教育，却还需要多下点工夫研究。比如教育的功能到底是什么？教育究竟能否产业化？推行教育券的困难在哪里？这些问题，关系到中国教育的未来走向，我想多一些讨论，多听一些意见，总是有益无害的吧。

教育是选拔人还是培养人

不是要证明是非黑白，不是那么绝对，我要说的只是一股强烈的感受。那就是中国的教育与美国相比，差距比想象大得多。

一开始，那只是难以名状的感受：虽然看到差别，却不知道根源在哪里。最容易观察到的，是美国学生好问。课堂上，随时有人举手，只要老师不是说到兴头上，就会让他们问。问题一提出来，你会暗暗惊讶：同学们跟得真紧！

第二是学生求学主动。我遇过一次，老师向学生道歉，说上礼拜的作业布置错了，是没有教过的内容，作业不用交了。但这个时候，

摇摇作者系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系博士生。

大家的作业其实已经交齐在讲台上。蛇有蛇路，鼠有鼠路，同学们就是懂得各师各法，主动出击。

三是讲座多。大学每个礼拜都举办很多讲座，演讲者不仅有教授，还有记者、法官、企业家，甚至其他学校来的学生。讲座是学校提供的基本服务。只要你到了学校，你就是学者，学者参加讲座是家常便饭。再大的学者，也是找张椅子坐下就听了。

四是学生的阅读面广。美国人爱读书。我说的是书，不只是报纸杂志漫画。地铁、公车、草坪、餐厅，到处都能见到在读书的人。读书不是庄严的事情，无需沐浴更衣，红袖添香。书拿起来就可以读了。而跟专业内的同学交谈，你会发现他们读过很多书。

这些只是零碎的观察，还串不起来。直到最近跟尹忠东谈起中国的教育，老朋友的话才给了我答案。他说：“现在国内的小孩读书很苦，但我想是难以避免的，因为我们的教育是一种挑选机制。它是选拔人，而不是培养人。考什么不要紧，要紧的是把人选出来。要选拔人，功课能不难吗？”

我恍然大悟，想起经济学家兰斯博格（~~张其成~~）。兰斯博格曾经以经济学教授的身份，给逐渐长大的女儿写过十多条生活忠告，比如怎样砍价等等，而其中一条格外重要：“千万不要在你没兴趣的领域追求成功，因为你得跟那些真有兴趣的人竞争。没有兴趣，你怎么斗得过人家？”

而我们则相反。中国人的教育原则，是千万要在自己没有兴趣的领域顶住，因为你很可能是在跟同样没兴趣的人竞争，所以坚持就是胜利。而所谓的胜利，就是被选拔，没别的意思。

要知道，一个人这么想这么做，没什么大不了；一代人这么想这么做，也没什么大不了；但整个社会一代接一代，源远流长的教育传统和用人机制，始终都是这么设想和实施的话，那就很不得了了。中美乃至东西方的教育差异，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它是要选拔人还是培养人，在于学者是有兴趣还是没兴趣。

要改善这个状况，必须从教育制度入手。想要让学者不仅按个性求学，还要在学成后能谋生，被社会接受，就必须把问题交给教育的

自由市场，就必须鼓励民间办学，让教育产业化和多元化。不搞教育产业化和多元化，中国人的智慧，还会继续被埋没。

教育产业化与民间办学

停止教育产业化，意味着中国的教育水平只会后退，不会前进。传来的消息是：之所以要停止教育产业化，是为了遏制学校乱收费的现象。而教育，据说是应该当作公益、而不是商业来办。

然而，古往今来，不准人赚钱的行业，就是办不好的行业。教育不可能是例外。世界上任何“质优价廉”的产品，无论汽车、电脑、相机、服装、电影、杂志、美食，都是既允许商人赚钱又不存在政府准入限制的行业；反之，任何“质劣价高”的产品，好像国内的电信、邮政、医疗、药品、教育，都是要么有价格管制，要么有准入限制，要么兼而有之的行业。

是的，学校乱收费现象的确普遍存在。但我们必须追问：为什么学校乱收费能得逞？最近有三百多位校长因乱收费而被革职。他们难道是商业奇才？难道是土匪强盗？他们若改行卖青菜豆腐，乱收费也能得逞吗？不能。他们之所以得逞，是因为求学的人多，而可选择的学校少，学生和家长别无选择。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革除乱收费的校长，有助于减少求学的人数，或增加学位的供应。也就是说，学位的短缺，不会因为革除校长而得到缓解。既然如此，那么禁止学校明码实价收费，就无异于鼓励个别人偷偷摸摸收费——因为不管怎样，学生对学位的激烈竞争，只会从一种形式转成另一种形式，而不会因为“宣布不准乱收费”而减弱或消失。

长期而言，把教育当作公益事业来办，结果就是教育质量下降、下降、再下降。跟花生、大豆、鸡蛋这些商品不同，教育质量是最难衡量、最容易偷工减料的。今天把学费统一压下去，明天师资就统一降下来，将来毕业生的品质更不会无端上升。

要提高中国的教育水平，恰恰不能停止教育产业化的进程。相

反，必须把教育的产业化进行到底：教育部门不仅要还学校自主招生、自主聘教、自主授课、自主定价的权力，更重要的是，还要解除对民间办学的诸多限制，把“鼓励民间办学”作为教育的基本国策。

必须指出，鼓励民间办学，与政府资助教育，两者完全可以并行不悖。政府真想资助贫穷的学生吗？真想缩小贫富学生的差距吗？当然可以，办法就是实施“教育券制度”。它的含义很简单：政府不再把教育基金直接投放给选定的学校，而是先向学生发放“教育券”；学生自由选择民间自由开办的学校，并向学校支付“教育券”；学校拿着靠实力赚取的“教育券”向政府兑现。

这个制度是 20 世纪 80 年代由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的。理论上无懈可击，但在美国各州零星试行，始终得不到普及，原因是阻力太大。阻力来自哪里？来自惯于与世无争的教师，来自惯于接受资助的校长，来自惯于行使拨款大权的官员。但即便如此，由于美国鼓励私人办学，私立学校在缺乏政府资助的竞争劣势下，也仍然办得有声有色。

中国的教育问题，与其说是产业化造成的，不如说是产业化不彻底造成的。要真正地、长远地提高中国的教育水平，就必须鼓励民间办学。而这么做的阻力，也恰恰来自教师团体和教育部门。他们是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统揽各级办学的审批权，设置办学的准入障碍，对他们有实质好处。这些实质好处很大，非三言两语所能撼动。但基本国策的设计者和社会评论者，要理解问题的症结倒并不困难。

教育券的困难

多年来，我一直认为推行教育券制度，不仅能显著减少教育经费的错用，还能从根本上提高教育质量。社会上反对教育券的意见很多，我一直不重视，认为它们都是因为不理解教育券而产生的。但最近忽然察觉并非反对者不明白教育券的好处，而是不明白教育券的深层困难。

让我先从教育券的含义说起。教育券制度，是指政府兴办教育的

责任不改，对教育的资助金额不减，但不再把教育资金层层下发给学校，而是直接向学生发放“教育券”；家长和学生凭“教育券”自由选择学校，并向学校支付“教育券”冲抵学费；成功争取到学生的学校，凭“教育券”向政府兑现。

教育券的好处是明显的。首先，它更公平。在教育券制度下，地处边远的穷学生也能足额地领取并支配政府在计划中给他们的教育资助；而在传统的做法下，穷学生只要考不上好学校，他们实际能享受的资助，就往往达不到计划中的人均额度，这是因为教育经费的划拨一向很不均匀，能就读好学校的学生，享受了大部分教育经费的缘故。

其次，教育券制度更有效。在传统的做法下，学校之间不能说完全没有竞争，但这些竞争，主要是面向作为拨款人的上级主管，而不是作为顾客的学生和家长。一旦引入教育券制度，学校和教师就必须直接面对学生、争取学生、向家长交待。在教育券这种竞争机制下，即使教育经费不增，教育质量也必定大大改善。

再有，教育券制度并不违背政府资助教育的前提。教育券制度本身，只是政府资助的发放制度的改革，而不是政府资助制度的改革。事实上，政府给每个学生的资助总是多多益善的。但不管多少，这种发放制度，总能减少中间环节的节流和耗损，让资金更大比例地落到受资助的学生和家长手上，供他们直接支配。

教育券的阻力在哪里？我过去的理解，而欧美的经验也证实，阻力来自学校和教师团体。这是因为，学校和教师将面对前所未有的竞争，原来一些习惯了照本宣科的教师，难以适应市场化的竞争挑战，所以他们会以各种理由反对教育券的实施。

这种阻力中外皆然，是意料之中的。但我认为它在中国并不算大，还可以克服。我过去感到乐观的理由有两个：一是教师的工资水平不算高，抵抗的积极性不及欧美的大，这一点我至今保持乐观；二是学生和家长都很容易在教育券的实施中尝到好处，从而水到渠成地形成一股压倒性的诉求，这一点我现在认为错了。

在过去倡议教育券的文章中，我曾经作过这样的类比：要是饭

馆的老板无权赚钱，厨师无权决定菜谱，而食客也无需埋单，那样的饭馆能炒出什么菜来？同样，要是校长无权赚钱，教师无权选择学生和教法，而学生也不用付费，那样的教育制度能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但我现在却要交待这类比错在哪里。是的，假如政府给每个人1000元的伙食补助，那么绝大多数人都会同意，把钱直接交给每个人，让他们自己到市场上选择餐厅是最佳办法。要是把这1000元层层下发，最后直接补贴给餐厅，然后让每个人到餐厅免费就餐，那么当中就有很大的效益耗损，结果每个人享受的饭菜，可能就只相当于300元的价值。

但到了教育问题，许多人的想法就变了：他们不愿亲手拽着1000元的教育券，到市场上寻找竞争中的学校，享受价值等于1000元的教育服务，而宁愿留在旧教育体制里，享受可能只值300元的教育服务。这是事实，很多人就是这么选择的。问题是为什么？为什么在吃饭问题上，他们更倾向于“抛弃公立食堂”，但在教育问题上，他们却更倾向于“保留公立学堂”？他们的选择是理智的吗？

恐怕是理智的，因为人们到食堂是要实实在在地安抚自己肚子，而人们到学堂则很大程度是为了擦亮自己的牌子。就是说，在教育问题上，人们关注的，首先不是教育的“质量层面”，而是教育的“标签层面”。人们要的首先是免费的教育，其次才是高质的教育。更直接地说，首先要文凭，其次才要素质。这解释了为什么“公立食堂”和“公立学堂”不能互作类比，为什么“教育市场”比“食品市场”更难让人理解和接受。

许多人相信，不管教学质量如何，“公立学堂”始终是廉价地获取文凭的保证。他们认为，政府普及教育，目的就是让人人都拿到某个程度的文凭，以符合“社会公平”的标准。这样的想法当然无可厚非，问题是，若人人都有文凭，就达不到最初帮助穷人改善处境的目的，因为若人人都中学毕业，那么就只有大学毕业才吃香；人人都大学毕业，那就只有博士文凭才吃香。

这样看，中国的教育问题错综复杂：教育经费本来就不足，在层

层划拨的体制下，落到学生手上的就更加可怜；教育券改革本可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但除了来自行政机构、学校和教师的阻力外，连家长和学生都可能出于“宁要文凭、不要素质”的考虑而加以反对；教育体系垄断了文凭发放权，在向家长和学生攫取垄断利润后，导致了文凭泛滥；因为水涨船高，学生和家长倾囊而出，为博取更高的文凭苦斗。这是一场恶性循环，代价是中国青年的才华和时光。

乙酉中国 金融变革时

巩胜利

摇摇甲申 1994 年，中外政界、经济学家、金融家、评论家们关注的焦点是：中国对金融业实施最彻底的手术：清除不良资产“黑洞”、对国有银行大规模注资，以按国际规则“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 8%”对银行进行“强身固本”，可以说都是破釜沉舟的大举措。与此同时，启动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改制上市，这两大金融“航空母舰”的出航，将使得中国的金融秩序、投资环境、资本市场等从源头和本质上发生根本性的改变。20 世纪初，中国官方公布的“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呆坏账率是 30%，1993 年末这个数字下降到了 15%，1994 年又有所反弹，增加了 500 亿。中国的国有银行面临一再靠中央政府反复注资、哺乳喂养，但依然长不大、做不强的怪圈。通过改制上市，是不是中国国有银行最后的晚餐？中国的银行业是不是从此就可以突出重围，找到一条自我发展、不断壮大的“柳暗花明”之路？事实上，中国国有银行的市场化方向改革，仅仅是揭开了历史的序幕。

摇摇作者系《中国投资》杂志华南办事处工作人员。

一、中国金融“大变革”

1995年是中国金融界 1978年以来最为天翻地覆的一年。据有关媒体报道：1995年 12月，中国政府为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两家国有商业银行再次剥离不良资产 14000亿元的协议在北京正式签署，这是中国实施改革开放、转型市场经济体制之后，继 1995年初对这两家银行注资 100亿美元，1995年转移出 14000亿元不良资产之后，五年内第三次对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施以援手。这“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累积的呆坏账之和超过了 1994年 12月 31日 14000亿元人民币^①，约占 1994年度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 15%

1995年，中国政府决定将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改为国有商业银行。“四大银行”提出，由于在专业银行时期形成了太多不良资产，希望由国家处置不良资产，使其大踏步过渡到商业银行。中国政府采纳了这一建议，专门成立了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不良资产 14000亿元。按理说，四大国有银行把 14000亿元人民币不良资产剥离后，应该可以大踏步地走向市场了。但有权权威数据显示：到 1995年 12月，这“四家”国有银行的呆死坏账又重新聚集到 14000亿元人民币^②，而到 1996年初这“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呆死坏账继续增加到 15000亿元人民币，1996年 12月，中国工商银行又在被国家审计局的审计中发现“死洞”就漏掉 100多亿。这就是说：自 1991—1995年这五年时间里，这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呆死坏账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事实的结果是，从 1991年到现在短短的五年间，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在继续上升，而且盈利水平仍然无法提高。无奈之下，1995年年初中国政府再次向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注资 100亿美元，12月再次剥离不良资产 14000亿元，并坚决启动了股份制改造和海外上市的进程。与以往政府屡次在困难时施以援手不同，这次启动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和海外上市实际上是对处于绝对垄断地位的“四大”国有银行发起了史无前例的“大变革”，是对中国银行业的一次根本